

清代道教史相关专题研究综述

汪桂平 马杰 高翔 罗巧芸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最近10余年来,清代道教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领域,学者们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学术论著,对于清代道教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在对清代道教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清代的名山宫观,清代的著名道士,清代道教传戒问题,清代道教宗派传承与谱系,清代道教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清代道教与地方社会等专题领域的研究展开回顾与总结,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展望和思考。

【关键词】清代道教;宗派;传戒;名山宫观;民间信仰

【作者简介】汪桂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研究生;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研究生;罗巧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研究生。

【原文出处】《清史论丛》(京),2021.第1辑.211~23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清代道教史研究”(项目编号:19AZJ003)阶段性成果,以及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中华续道藏”(批准号:中央统战部统办函[2018]576号)专题研究成果。

道教历史研究是百年来道教研究永恒不变的主题和重点,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界尤其关注区域道教史和断代道教史的研究,相关领域一直都是研究热点。在断代研究方面,清代道教研究曾经长期是道教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但最近一二十年来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渐成热点领域,研究主题在不断深化,研究成果亦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有涉及清代道教研究的著述数十部^①,论文近千篇。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大致集中于以下专题:清代道教名山宫观研究,清代著名道士研究,清代道教传戒问题研究,清代道教宗派传承与谱系研究,清代道教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关系研究,清代道教与地方社会研究,等等。因此,本文在对清代道教研究成果进行广泛梳理的基础上,将重点关注上述几个专题,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进行扼要综述,以总结清代道教研究的现有状况,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展望与思考。

一、清代道教名山宫观研究

清代道教宫观、道士众多,康熙六年(1667)的官

方统计资料为:“礼部通计,直省敕建大寺庙共六千七十有三,小寺庙共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庙共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庙共五万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僧十有一万二千九十二名,道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有五名。共计寺庙七万九千六百二十有二,僧尼道士十有四万一百九十三名。”^②可见,康熙六年全国有大小寺观近8万座,僧尼道士14万多,其中道士占2万多,约占总数的1/7,但道观数未说明,估计也应约占总数的1/7,1万多座。这是清朝初年的统计。到了清朝中期,随着国力增强,人口增加,僧道人数更多。现据存下来的乾隆年间的档案记载,在乾隆二年至四年(1737-1739)历时3年的宗教人口普查中,共有340113名僧人与道士备案在册,在这34万多的僧道人口中,据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统计推测,其中佛教徒为294531人,道教徒为45582人^③。面对如此众多的宫观和道士,一些学者关注其地域分布的统计和研究,如法国学者高万桑。一些学者则关注宫观制度史和宫观网络的研究,如王见川《近代(1840-1949)变局下的张天师——兼谈其对华南道教之影响》^④、高万桑《清代江南地区

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⑤等。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学者关注各地名山宫观的个案研究,如道教名山武当山、齐云山、龙虎山、青城山、穹窿山、茅山、罗浮山、委羽山、终南山、嵩山等,都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调查和研究。著名道观,如北京白云观、北京东岳庙、北京都城隍庙、北京大高玄殿、中岳庙、南岳庙、西岳庙、北岳庙、上海白云观、上海城隍庙、武汉长春观、成都青羊宫、成都武侯祠、汉中张良庙、西安八仙宫、广州纯阳观等,亦有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

1. 武当山道教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对道教名山武当山的山志、碑刻和历史进行整理与研究,出版了数部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张华鹏、张富清等编《武当山金石录》(1990),王光德、杨立志等《武当道教史略》(1993)等。2007年,梅莉著《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⑥出版。2018年,刘永、杨立志主编的《武当山金石碑刻选录》^⑦出版。著作之外,学者们更发表了大量关于武当山及其宫观研究的学术论文,对于武当山道教文化和碑刻资料的整理研究不断深化,研究内容涉及武当山的香会信俗、道派传播、神灵信仰等诸多方面。其中,梅莉教授长期关注、调查和研究武当山的香会活动,不仅出版专著《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而且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如《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以武当山现存碑刻为考察中心》《明清时期武当山朝香习俗研究》《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的地理分布》《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的祈求愿望》《明清政府对武当山进香的管理》^⑧,利用大量的碑刻资料,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习俗的流行、香客的地理分布展开了深入研究,对于朝廷对武当山的管理和香税的征收使用,也有一定研究。亦有不少其他学者关注和研究武当山的道派问题,如杨立志《三山滴血派与武当清微派》^⑨、陈金凤《宋元明清时期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发展述论》^⑩、梅莉《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中兴初探》《清代武当山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与武当山宫观的复修》等论文,都对武当山的道派问题有所研究,认为清代武当山除了正一派、清微派之外,还有其他道派,如全真派,尤其是清代,武当山的全真派呈现

出兴盛景象。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张玲的学位论文《武当清微派研究》(2012),对武当清微派进行了专门探讨。总之,关于道教名山武当山的道教文化,尤其是清代武当山的道派、碑刻和朝山进香习俗等,得到不少学者持续关注和研究,研究深度也在不断拓展。

2. 北京白云观研究

北京白云观作为坐落于京城的一座道教名观,不仅是北京重要的道教宫观场所,也是全真教龙门派的祖庭,因此,对北京白云观的研究一直是百年来道教研究的热点领域。早在1934年,就有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⑪出版,该书是对中国道观所做的最早的实地调查报名,也是20世纪的第一部宫观志,书中不仅考证了白云观从唐代建立到清代的发展历史,而且还刊载了白云观历代方丈、道士小传、道教规戒、道教宗派、白云观碑志、道士生活等多方位的实地调查资料。此后,又有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到北京白云观实地调查多年,于1945年出版了《白云观的道教》^⑫一书。该书对北京白云观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尤其是对白云观道士的日常生活和祭神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亦有研究北京白云观的文章发表,如罗桑彭措述《北平白云观道学渊源考》,在《正风半月刊》上分多期发表。^⑬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北京白云观的研究成果更多。如2003年,李养正的《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出版^⑭;2011年,李信军主编的《水陆神全:北京白云观藏历代道教水陆画》出版^⑮;2018年,付海晏《北京白云观与近代社会》出版^⑯。这些著作对于清代北京白云观的历史、文献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有关北京白云观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发表。华中师范大学的付海晏教授长期研究北京白云观与社会的关系,在《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⑰一文中,他梳理了北京白云观在宗教、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影响,认为晚清白云观成为京城大众重要的宗教生活以及游客场所。他在其另一篇文章《游观何为?民国初年城市游乐与大众文化中的白云观》^⑱一文中认为,白云观在晚清民国时期虽然

受到时局或战争的影响,但是依然能够成为北京地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巧薇博士在《清乾嘉时期北京白云观事考论》^①一文中,根据现存的清代档案记载及其相关文献的梳理,理清并讨论了清高宗两次敕修白云观的史实,以及清仁宗发旨稽查白云观道士事件等。尹志华教授亦写有多篇有关北京白云观的论文,如《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云观传戒考述》^②《北京白云观藏历代律师方丈监院画像的史料价值》^③《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初探》^④《清代北京白云观住持(方丈)、监院传承考》^⑤等,考察了清代北京白云观的传戒和传承等问题。

总之,学者们从实地调查、碑刻、档案、笔记、文集等资料出发,对于北京白云观的历史、建筑、收藏、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取得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关于清代北京白云观三百年的历史传承及其与京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关系,尚未完全梳理清楚,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史料和细致研究。

3. 北京东岳庙研究

北京东岳庙被称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道教正一派道观,是清代国家祭祀的重要庙宇,也是京城民间信仰的重要场所,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研究成果众多。早在1924年,历史学者顾颉刚在《歌谣》周刊发表了《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一文。1936年,刘厚滋先生对北京东岳庙的碑刻进行了系统整理,出版了《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⑥一书。1934年,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出版,对北京东岳庙的历史、碑刻等进行了初步研究。1939年,叶郭立诚出版《北平东岳庙调查》^⑦一书,对北京东岳庙的历史沿革、传说故事和神灵属性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北京东岳庙的研究日渐增多。2002年,陈巴黎编著《北京东岳庙》^⑧一书出版,对东岳庙的历史、建筑、神灵信仰、碑刻、香会等进行了系统梳理。2004年,赵世瑜主编的《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⑨出版,对东岳庙的碑刻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2018年,东岳庙住持袁志鸿主编的《北京东岳庙志》上下册出版^⑩,成为北京东岳庙历史上的首部完整意义上的庙志。

著作之外,不少学者发表了研究东岳庙的论文。

据关昕在《北京东岳庙研究综述》^⑪一文的梳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北京东岳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如傅长青的《回忆东岳庙》^⑫等;二是东岳庙历史的研究,关注和研究的学者有施舟人、袁冰凌、陈巴黎、曹彦生、樊光春、汪桂平、林巧薇等;三是对东岳庙香会及地方社会民俗的研究;四是对北京东岳庙开发利用的研究。那么,对于清代北京东岳庙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碑刻资料的整理、祭祀典礼、历史传承和香会研究等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发表,反映了北京东岳庙研究的新进展。如关于北京东岳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林巧薇的《北京东岳庙与明清国家祭祀关系探研》^⑬,关昕的《从明清北京东岳庙祀典看“小祀”制度的融通性》^⑭, Anne Swann Goodrich(富平安)著《民俗宗教与皇家祭祀:北京东岳庙供奉诸神之考察》^⑮,高寿仙《国家祀典、儒家理念与民俗信仰的冲突与交融——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的考察》^⑯等论文,都对北京东岳庙在明清国家祭祀系统中的地位和典制进行了多角度的梳理与探讨。

另外,汪桂平的《北京东岳庙下院天仙宫小考》^⑰,考证了东岳庙有下院天仙宫的史实,纠正了叶郭立诚在《北平东岳庙调查》中所说的“历来无香火地及下院”的说法。林巧薇的《元朝至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与住持传继》^⑱,常人春、陶金《北京东岳庙道场疏文稿集初探——管窥清代北京东岳庙道场及道士的多重社会身份》^⑲,张莉《清宫对北京东岳庙的有效管理》^⑳,以及陈巴黎《从碑刻资料看北京东岳庙的香会组织》、陈进国《〈燕行录〉咏北京东岳庙诗抄》、王婧泽《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笔下的北京东岳庙及其文化心理》、梁茵《传承与变迁:北京东岳庙信仰活动的日常与节日》、萧放的《东岳庙与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北京东岳庙为例》等论文^㉑,都对清代北京东岳庙的历史传承、道场活动、香会组织、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细致研究,有不少新史料的发现和新观点的提出。

4. 其他名山宫观研究

上述名山宫观之外,其他的清代道教名山和宫观亦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如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北京都城隍庙、北京

大高玄殿、嵩山中岳庙、上海白云观、上海城隍庙、武汉长春观、成都青羊宫、成都二仙庵、西安八仙宫、汉中张良庙、西安重阳宫、广州纯阳观、罗浮山冲虚观以及齐云山、龙虎山、青城山、穹窿山、茅山、天台山、崆峒山等,都有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

沈阳太清宫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十方丛林制道观,日本学者于1938年出版了《道教丛林太清宫志》^①一书,是第一部研究沈阳太清宫的专志。2015年,该书中译本出版。此外,孙嗣志等《太清宫开山祖师郭守真》^②、郁其文《太清宫纪实》^③、汪桂平《沈阳太清宫历代传戒考略》^④等论文对沈阳太清宫的宗派传承和传戒活动都有所研究。

大高玄殿是明清两代皇家御用道观,杨新城撰《明清大高玄殿建筑史料表》^⑤《大高玄殿建筑群变迁考略》^⑥,详细研究了大高玄殿的建筑类型、建筑彩画等;李友唐在《北京大高玄殿》^⑦一文中,对大高玄殿的地理位置和布局及其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王方捷、何蓓洁在《清乾隆朝大高玄殿建筑群演变探析》^⑧一文中,对乾隆帝从组群、单体及形而上三个层面改造大高玄殿的史事进行爬梳,体现大高玄殿集观、坛、庙三重身份于一体的独特性。此外,杨靖筠、刘淑一的《北京城中轴线上的皇家道观——大高玄殿》^⑨,高换婷的《明清之际的大高玄殿》^⑩,王建涛的《大高玄殿的沧桑岁月(上)》^⑪《大高玄殿的沧桑岁月(下)》^⑫,刘文丰的《皇城道观大高玄殿》^⑬,陶金的《大高玄殿的道士与道场——管窥明清北京宫廷的道教活动》^⑭等文,对于大高玄殿的历史沿革、建筑形制、宗教活动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

李合春、丁常春编著《青羊宫二仙庵志》^⑮,考察了成都青羊宫、成都二仙庵在清代修建情况和著名道士的事迹。王士伟著《楼观道源流考》^⑯,对清代楼观道教的复兴作了细致考述。张建新、陈月琴编著《西安八仙宫》^⑰,详细考察了清代八仙宫的殿宇修建、著名道士等,并认为清代是八仙宫发展的鼎盛时期。张文主编的《丘处机与龙门洞》^⑱,王西平、陈法永主编的《重阳宫与全真道》^⑲等,都对清代道教著名场所龙门洞和重阳宫等进行了考述。黎志添在《广东地方道教研究》^⑳中,对罗浮山冲虚观及酥醪观、惠州元妙观、广州三元宫的历史传承进行详细考察。

吴亚魁在《江南全真道教》一书中,对湖州金盖山、杭州金鼓洞、余杭洞霄宫和上海白云观等道观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汪桂平在《东北全真道研究》一书中,对东北道教宫观沈阳太清宫、沈阳关岳庙、千山无量观、铁刹山三清观、喀左天成观等进行了个案研究。

此外,陈莲笙的《海上白云观》^㉑,王丽的《论清初盛京“皇家道院”三官庙》^㉒,冯岁平、余星银的《清代陕西勉县武侯祠研究》^㉓,樊光春《陕西留坝张良庙十方丛林志》^㉔,梅莉和张朗的《晚清武汉长春观的崛起》^㉕,赵建永的《中国北方妈祖文化中心——天津天后宫》^㉖,张广保的《道教与嵩山中岳庙的国家祭祀》^㉗,王纯五的《青城山道教的宗派和现状》^㉘,王晓乔的《清代道士与成都武侯祠》^㉙,尹志华的《清代委羽山道教略述》^㉚《清末民国时期的宝金山玉虚宫》^㉛,贾晓龙的《明清时期兴隆山道教史研究》^㉜等论文,对于清代各地的道教名山和宫观都展开有一定的研究。

二、清代著名道士研究

据清代康熙六年的官方统计资料,全国有道士2万余人,到了清乾隆四年,道士人数达到4万余人。不过,有清一代,著名道士或留下著作的道士并不多。其中,著名者如王常月、施道渊、娄近垣、刘一明、闵一得、傅金铨、李明彻、张清夜、李皓白、王圆箓、高仁峒、任永真、刘诚印、刘名瑞、张宗璿、阎永和等人,大多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法国学者高万桑曾对道士群体展开研究,其发表的《1700—1950年的全真道士》^①一文,从全真道士的数量和地理分布、道门生涯、全真法派、清规戒律、云游参访等方面,全面勾勒了清代全真道士的状况。高万桑的另一部著作《1800—1949年北京的道士:都市道士的社会历史》^②,对清代北京白云观的住持传承、道士生活、传戒活动、道士与清廷的关系,以及全真南无派道士刘名瑞等,做了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吴真在《华北地方社会中的全真道士:以华山法派赓续与公共庙宇经营为中心》^③一文中,也对华北的全真道士群体进行了研究。不过,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还是个别的著名道士,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著述和思想等方面。

1. 王常月

王常月(? ~ 1680),清初著名龙门派道士,全真

道龙门支派律宗的第七代律师。他倡行公开传戒,使得本已衰落的龙门派出现复兴局面,王常月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祖”。由于他在全真道历史上的特别贡献,因而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学者如唐大潮、张钦、张应超、邝国强、李永明、乐爱国、尹志华、李安、张巍青等分别从王常月的修道思想、修炼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戒律思想、改革思想等诸多方面展开研究,撰写博士论文或发表文章^③。2011年,尹志华编著的《王常月学案》^④出版,对王常月的生平和著作、主要思想、传戒活动及历史影响等进行了研究,并辑录相关文献资料,使王常月的研究走向深化。而国外学者如莫妮卡等,则更多地质疑王常月大规模传戒的历史真实性。尹志华通过查阅清代诗文集相关史料,证明了王常月其人及其传戒的真实存在。

2. 施道渊

施道渊(? ~1678),清初著名道士,他修复穹窿山上真观等宫观,开创了穹窿山支派,对苏州道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施道渊的研究,亦有不少学者,如熊建伟《施道渊传略》,周冶《施道渊穹窿山法派考述》,王见川《彭定求的扶鸾与著书:从其与清初著名道士施道渊的关系谈起》^⑤等论文,对施道渊生平、道派和影响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3. 娄近垣

娄近垣是清初著名的正一派道士,与雍正、乾隆皇帝关系密切,受封为妙正真人。关于娄近垣的生平事迹,国内外学者皆有研究,如日本学者细谷良夫在《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娄近垣为中心》^⑥一文中,探究了娄近垣的政治角色及其对龙虎山正一派的影响;曾召南撰《娄近垣及其与正一支派的关系》^⑦,讨论了娄近垣创立正乙派的历史背景以及该支派的传承;孔祥毓《妙正真人娄近垣的生平著作及思想》^⑧一文,对于娄近垣生平、著述和思想都有简要的考述;陈星宇《论清初道士娄近垣的白话诗——兼及与雍正禅学的关系》^⑨则重点分析了娄近垣创作的白话诗与雍正禅学的关系;罗文华的《清代高道娄近垣事迹考述》^⑩一文,广泛搜集资料,对娄近垣的生平、籍贯、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考究,

发前人所未发,如娄近垣与当时文人郑板桥、纪昀的交往事迹等,皆前人未曾关注的。总之,关于娄近垣的生平事迹与道派等,学者研究较多,而对于娄近垣的道教著述、科仪思想等方面,则涉足较少。

4. 刘一明

刘一明(1734-1821),号悟元子,别号素朴散人。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清代著名内丹家。长期隐居甘肃榆中县栖云山、兴隆山修道,设坛传教,著书立说,成为晋、陕、甘、宁一带颇具影响的全真龙门派道士。

学界对刘一明的生平和内丹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相关著作有刘仲宇《刘一明学案》,刘宁《刘一明修道思想研究》,丁述学《刘一明与兴隆山》^⑪等。相关论文更多,如李远国《刘一明“九要八法”概述》,詹石窗《刘一明诗歌的道教内涵及其审美旨趣》,吴受琚《刘一明道行考》,白嫫棠《刘一明金丹论对阳明良知论的融摄》,陈伟华《刘一明的阴阳思想探析》,何建明《刘一明道教养生哲学方法论和境界说》,杨光文《刘一明的修心养性思想及其现代思考——以〈神室八法〉为例》,徐恩栓《略说刘一明〈易理阐真〉的丹易合一思想》,贾来生《刘一明丹道养生思想的贡献和现代价值》,《刘一明丹道养生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初探》,刘仲宇《通关与身体健康:读刘一明〈通关文〉有感》,谭清华《刘一明〈道书十二种〉农学思想考述》,王闯《论刘一明〈道德经会义〉的诠释特点》^⑫等。近年来,对刘一明的研究逐渐升温,以刘一明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硕博士论文就有10多部。如王永平《清代刘一明的道学思想》(2002),赵相彬《刘一明内丹思想研究》(2008),贾海辉《刘一明老学思想研究》(2011),计拓《刘一明三教合一思想研究》(2012),王景霖《刘一明的易学本体论探析》(2013),宋宇《清代刘一明丹道思想特色分析》(2016),王楠《刘一明易学生命哲学思想研究》(2017),李艺芊《刘一明三教合一思想探析》(2019),辛敬《刘一明内丹学新探》(2020)^⑬等。总之,对于清代道士刘一明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刘一明的生平、思想、丹道、养生等层面。

5. 闵一得

闵一得(1749-1836),号小艮,派名一得,别号懒云子,为清代著名道士,内丹学家,龙门派第十一代

传人。闵一得长期隐居于浙江湖州金盖山,著述颇丰,撰有《金盖心灯》八卷,记载了全真教龙门派第一代至第十四代一百余人的生平事迹。又纂有《古书隐楼藏书》,收清人和自撰内丹书30余种。国内外关注和研究闵一得的学者较多,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如意大利学者莫尼卡、日本学者森由利亚、法国学者高万桑等都有关于闵一得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著述更多,如吴亚魁《金盖山人闵一得传略》、陈云《闵一得生年及名号考》《闵一得著作考释》、赖全《闵一得生年新考》^⑥等论文,对闵一得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辨。李远国《论闵一得丹法的几点特征》、盖建民《闵一得与道教“医世”思想》、唐大潮《试析闵一得“真一”、“真元”论及其三教观》、刘焕玲《试析闵一得之龙门方便法门》、吴大振《闵一得内丹养生思想探微》、李汉超和陈志丹:《闵一得修身治世之哲学阐释》、张晟《闵一得“炼神还虚”论发微》,以及陈云《闵一得的女丹思想》《闵一得三教思想分析》^⑦等论著,则对闵一得的思想、丹法等进行了探讨。陈云《清代道士闵一得研究中的问题点及其进展》^⑧一文对闵一得研究中的问题点及其进展作了梳理。

随着对闵一得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闵一得的博士论文也形成专著出版,近年来出版了两部相关的专著:一是赖全的《统合与革新:闵一得研究》^⑨,一是陈云的《闵一得研究》^⑩。二书均对闵一得的生平、著述、思想、道派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

6. 傅金铨

傅金铨,字鼎云,号济一子,清代嘉道年间著名内丹家。著作丰富,徒裔众多,在巴、渝地区影响极大。撰有《人药镜注》《天仙正理读法点睛》《道书试金石》《道书一贯真机易简录》《杯溪集》《性天正鹄》等,大致都收录于《济一子道书十七种》中。学术界对于傅金铨亦比较关注,出版了一些成果,如曾召南《道士傅金铨思想述略》、朱越利《清代道士傅金铨小考》、于兴汉《试论傅金铨的道家教育思想》^⑪等论文,考述了傅金铨的生平和思想。而谢正强的博士论文《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⑫亦已出版,全面考察了傅金铨的全平、著述、丹道理论及其特色。

7. 李明彻

李明彻(1751-1832),号青来,广东番禺人,清朝

乾隆至道光间著名全真道士、天文学家。他修建广州纯阳观,善画、钻研天文学,且均有成就。其著作《圆天图说》《圆天图说续编》,具有较高的天文学水平。关注和研究李明彻的当代学者不少,这方面的论著有陈泽泓《著〈寰天图说〉建朝斗高台——清代自学成材的天文学家、道士李明彻》、龙加林《一代大师——李青来》、甄鹏《清朝道士李明彻及其科学成就研究》《李明彻考评》、王丽英《真有道之士——晚清道士李明彻散论》以及王丽英、黄银鸽《岭南全真高道李明彻与广州纯阳观》^⑬等。

8. 王圆箓

王圆箓(约1850-1931),清末甘肃敦煌道士,由于他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而成为后世研究和评论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于王道士的生平以及对藏经洞发现与流散的功过评价等方面。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⑭、沙武田《藏经洞史话》^⑮、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⑯、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箓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⑰、方广钊《王道士名称考》^⑱、方莉《“福琳”似非王道士本名》^⑲等研究成果,对王道士的姓名、籍贯和生平事迹研究得比较深入。如方广钊在《王道士名称考》中指出:王道士俗名王福琳,出家为道士后称王园禄,逝世后按照道教习俗被称为王园箓,至于目前最为流行的王圆箓,至今并未发现有确凿的文献依据。而方莉在《“福琳”似非王道士本名》一文中认为,“福琳”并不是王道士俗名,而是另一位佛教人士。

对于王道士的功过是非,则相关论述和评论更多,如樊光春的《功过难评王圆箓——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背景剖析》和《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⑳、李传玺《活着的王圆箓》^㉑、张振国《是是非非王圆箓》^㉒,以及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㉓、高德祥《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箓》^㉔和余秋雨《道士塔》^㉕等,大家评价不一,各种观点都有。据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中总结,对王圆箓的功过大致有四种意见:功罪各半、有功有过、有功无过、历史罪人。最后樊教授认为,王圆箓作为一名全真道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宗教家;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保护的過程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不应当予以苛责,更不宜视作历史罪人,余秋雨的《道士塔》应当从教材中撤除。

9. 其他清代道士研究

清代道士人数众多,各地都有一些著名的道教人物,散载于地方志、宫观志、诗文集、碑刻等文献中,当代学者也多有发掘和研究,相关的论文也不少,如:孙嗣志和蒋镇浩《太清宫开山祖师郭守真》^⑨、孙诚《郭守真与东北道教的传播》^⑩、丁常云《海上白云观开山祖师徐至成》^⑪、南岳道教协会《南岳清代高道李皓白》^⑫、陈月琴《董清奇与〈除欲究本〉》^⑬、王安明《二王庙道教事业的开拓者——王来通》^⑭、张方《明末全真道士郭静中生平考略》^⑮、黄新华《清初苏州道士李朴其人其事》^⑯、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日本机密档案中的白云观与高道士》^⑰,等等,这些论文对于其他的清代著名道士如郭守真、徐至成、李皓白、董清奇、王来通、郭静中、李朴等有所介绍和研究。

三、清代道教传戒问题研究

关于清代全真道传戒的研究,最近10余年来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王常月其人及其大规模传戒的真实性;二是大规模传戒活动中断的原因;三是清代各地宫观开坛传戒的状况;四是清代传戒文献的新发现和研究。

意大利学者莫尼卡、日本学者森由利亚教授都对王常月是否清初在北京白云观传戒提出疑问。中国学者尹志华教授发表《清代全真道传戒初探》^⑱《清代全真道传戒若干史实再考察》^⑲等论文,根据康熙时文人王沅、郝浴、沈季友、詹贤等人的记述,确定王常月其人的存在,以及传戒的真实性。根据果亲王允礼的题词,证实康熙皇帝曾赐给王常月紫衣。

尹志华在《清代全真道传戒若干史实再考察》一文中,还探讨了王常月的徒孙詹太林之后,全真道大规模传戒活动中断的原因,认为詹太林的首座弟子(即法嗣)唐清善已先他而逝,而詹太林本人欲将茅山乾元观开辟为十方丛林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这样在他仙逝后,公认的传戒系统中断了,全真道又进入了各个系统自行传戒的状态。

关于清代全真道在全国各地传戒的状况,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尹志华《嘉庆至清末京外全真丛林传戒考》^⑳,对嘉庆至清末京外全真丛林的传戒活动进行了整理,包括传戒时间、传戒道观以及传戒律

师;郭峰《晚清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传戒研究》^㉑,从《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入手,对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圆)传戒做了重点分析;郭峰、梅莉《晚清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传戒历史初探》^㉒,考证了福星观的几次传戒活动;王辉刚《晚清民国成都二仙庵传戒研究》^㉓,研究了成都二仙庵从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的几次传戒活动。此外,汪桂平《沈阳太清宫历代传戒考略》^㉔、尹志华《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云观传戒考述》^㉕等论文,还对于沈阳太清宫和北京白云观的传戒活动进行了考述。

关于清代全真道传戒的资料,被不断发现和整理。如汪桂平《清代全真道授戒的珍贵文存》^㉖一文,介绍了三种清代全真道传戒、授戒的珍贵文存。一种为同治十二年(1873)受戒弟子王信祉领受的《太上真传守戒必持》5本,包括《初真戒》1卷、《中极戒》1卷、《天仙大戒》1卷、《守戒必持》1卷、《登真箓》1卷;一种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戒弟子范德寿领受的《初真戒律》1卷;一种为同治十三年(1874)房永谦抄写的《玄都律坛威仪戒律全部》抄本。这三种珍贵文献真实完整地记录了清代全真道士传戒、授戒的相关情况。尹志华《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初探》^㉗《清代全真道传戒史料补述》^㉘等文,介绍了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北京白云观藏王常月画像题词,清初名臣郝浴(1623-1683)代人撰写的《鼎新吴山第一峰茅君宫疏引》,以及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庄公院碑记等新发现的关于全真道传戒的重要资料。

除了对全真道传戒历史和文献进行研究外,亦有学者探讨了南宗传戒以及佛教与全真道传戒的比较问题。李远国《南宗道教历史与传戒授箓的考辨》^㉙,对南宗道教历史与传戒授箓进行了考辨;马海燕《明清佛教与全真道传戒研究发微》^㉚,对明清佛教与全真道在传戒事宜方面的相似性做了探讨,认为从戒本授戒或手卷传承来看,全真道与当时的佛教各宗派的确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而总体上看,全真龙门派的传戒法系兼有佛教禅宗授戒法系和律宗授戒法系的特点。

四、清代道教宗派传承与谱系研究

明代以来,道教大致划分为全真道与正一道两

大派别。但实际上,道教内部派系林立,传承有序,清代实际存在的道教派别有100余种。学者们陆续发现了几种记载道派的文献,如北京白云观民国抄本《诸真宗派总簿》、《铁刹山志》卷七所载《道教宗派》、《太清宫志》所载《宗派别》等,王卡研究员在《诸真宗派源流校读记》^①一文中,将存世的上述几种记载道教宗派的抄本进行合校,复原出一个相对完整和原始的本子,取名《诸真宗派源流》,成为研究清代道教宗派的一份难得的文献,根据这份文献,当时记录的道教派别有102种。实际上,没有收入该书的道教派别还有不少。

关于清代道教宗派的研究,学术界比较集中关注的是清代全真道的宗派问题。赵卫东在《全真道宗派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②一文中指出,国外学者真正自觉关注全真道宗派问题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莫尼卡、森由利亚、高万桑等都曾撰写文章,对全真道龙门派的宗派传承与宗派认同进行研究,并针对已有的关于全真道龙门派起源与传承的观点进行质疑。其中莫尼卡与森由利亚都是通过质疑《金盖心灯》的龙门派传承而涉及了全真道宗派问题,但二人的问题意识却有差异,莫尼卡关注的主要是《金盖心灯》龙门派传承的真实性与王常月在这一谱系形成中的作用,而森由利亚所关注的则是龙门派系谱意识的形成问题,正是因为莫尼卡与森由利亚等对龙门派传承的质疑,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全真道宗派问题的思考,从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使其成为了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10余年来,道教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与全真道宗派问题相关的学术成果,使该问题研究取得很多重要进展,学者们通过对碑刻、道谱等史料的发掘和梳理,证实了道教众多派别在各地的真实存在和传承。张广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③、郭武《有关全真道宗派“字谱”研究综述》^④等文,对于明代全真道的宗派研究情况已有详细介绍。本文将重点介绍清代道教宗派研究的相关成果。

赵卫东教授一直专注全真道宗派问题的研究,发表有多篇论文。其在《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⑤一文中,通过泰山三阳观现存12通道士墓碑,证实了自明嘉靖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泰山

三阳观道士皆属于果老祖师云阳派,而且墓碑上还刻有该派的系谱。赵卫东又在一篇论文《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⑥中,证实了邱祖又派的存在,而且考证出邱祖又派的创立者为东明代镇庙道士唐教玉,此派由华山派中分离而来。赵卫东在《青州全真修真宫考》^⑦一文中,对山东青州修真宫的宗派传承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自明正德八年(1513)至清嘉庆十二年(1807)中,修真宫全真道龙门派道脉自第八代一直传到第二十代,未曾间断。赵卫东在《河南济源全真道宗派传承考》^⑧一文中,考察了济源地区的全真道宗派,并通过现存碑刻证实了尹喜派的存在。赵卫东在《李常明一系龙门派传承考》^⑨文章中,明晰了清代以来山东地区李常明一系的龙门派传承,认为全真道龙门派的起源与传承是“多源众流”,而非“一源多流”。

樊光春先生研究西北地区道教教派问题,成果很多。其《西北道教史》一书,全面梳理了明代以来西北地区的道派传承情况。其在《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⑩一文中,对陕西佳县白云观龙门派自明万历年间以来的传承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

汪桂平研究员多年来研究东北地区的道教,其《东北全真道研究》一书,涉及清代东北地区存在的全真道龙门派、华山派、金山派、蓬莱派、金辉派、尹喜派等道派,对其传承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重点梳理了东北最主要道教流派——郭守真一系龙门派关东十四支的传承谱系。何建明《东北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源流——以旅顺口长春庵、老爷庙为例》^⑪则探讨了东北全真华山派在家道系统传承的形成和变迁。

吴亚魁著《江南全真道教》一书,对清代湖州金盖山云巢支派和金盖山支派的传承情况进行了研究。吴亚魁又在《江南全真道门所见之诸真宗派与传承谱系》^⑫一文中,对江南地区全真道宗派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尹志华的著作《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对清代各地各时期全真道的宗派传承情况做了系统研究,对于了解清代全真道宗派传承的总体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尹志华又发表《晚清全真道新探》^⑬《清代委羽山

道教略述》等论文,涉及霍山派的创立与传承、金盖山各分坛的创立、委羽山大有宫全真道脉传承等问题的研究。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監庙探析》^⑩一文,探讨了清代霍山派的创立与传承情况。

李大华在《论华南全真道教的宗派关系》^⑪一文中,通过追溯张三丰的全真嫡传弟子派系,指出了以往认知中龙门派是全真道正宗的错误之处;通过华南地区的史料研究发现,华南地区早在明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全真道传道迹象,清代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

秦国帅《明清以来(1368-1949)泰山道派考略》^⑫一文,考察了明清泰山及其周围地区道观的宗派传承情况,发现明清时期泰山具有华山派、龙门派、龙门华山派、周祖铁冠派、果老祖师云阳派、吕祖蓬莱派等全真道宗派的存在,并详细考证了它们的传承情况。

张方在《碑刻所见介休后土庙龙门派传承》^⑬一文中,考察了山西介休后土庙的龙门派传承,认为大约在明正德年间,介休后土庙、城隍庙的全真道士开始从“德”字辈使用龙门派字谱,至清嘉庆年间的“教”字辈时,一共传承了十六代。

以上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多是全真道诸宗派问题。亦有学者关注全真道之外的其他道派,如天师道、净明道、清微派等。王卡《清代天师道概述》^⑭对清代天师道的兴衰沿革史进行了梳理研究。郭武发表了《明清时期全真道与净明道关系略论——以逍遥山万寿宫为中心》《明清净明道与全真道关系略论——以人物交往及师承关系为中心》《朱道朗与青云派》^⑮等论文,探讨了净明道与全真道的思想融通及道派兼承的问题。曲爽、张炜在《清微派传承考——以赵宜真、李得晟传天津天后宫一系为主》^⑯论文中,梳理出清微派于明朝至民国时期在天津的发展与传承。陈文龙《闾皂山宫观史及其灵宝派传承世系考》^⑰一文,探讨唐代到清代闾皂山宫观及其灵宝宗坛传承的历史,到清雍正十二年(1734),闾皂山灵宝派共传了七十三代。王纯五在《青城山道教的宗派和现状》一文中,着重整理了天师道正一派、上清派、清微派、全真道龙门派在青城山地区的发展轨迹。周冶在《施道渊穹窿山法派考述》一文中,梳

理了穹窿山法派在清代时期的传播与发展,以及一直传承至今的状况。刘雄峰《明清以来山西正一道教的演变和融合——对数个碑刻资料的解读和田野调查所证》^⑱则考察了明代以来山西正一道的情况。

总之,以上关于清代道教宗派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清代各地区各宗派存在状况及其传承谱系的研究;二是清代各宗派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们通过对碑刻等资料的挖掘和梳理,证实了《诸真宗派总簿》等文献记载中诸多宗派存在的真实性,有些宗派甚至一直传承至今。

五、清代道教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关系研究

清代道教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关系,反映了道教对地方社会、民众文化的关联与影响,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于真武大帝、碧霞元君、文昌、关帝等道教与民间共奉的神灵对民间社会的影响,关于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等,都有不俗的研究成果。

1. 清代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互动研究

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教的神灵信仰和仪式规范,常常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参考和范式,而民间信仰诸神也常常演变为道教信奉的神灵。学者们对不同地域个案的研究,证明了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张超然在《专醮酬恩:近代道教为民间信仰所提供的仪式服务》^⑲中,从醮仪的种类与发展、湖北麻城清微醮科与当地民间信仰、醮科结构与编写方式三个方面梳理斋、醮两种不同类型的道教仪式在历史上的发展以及各自负载的仪式功能。

魏德毓在《明以来正统道教世俗化与民间仪式传统建构》^⑳一文中认为,是道教深入民间社会的过程推动了民间仪式传统的建构。魏德毓在另一篇文章《明以来正一派道教的世俗化——对闽西火居道士的调查》^㉑中认为,明中叶以来的道教世俗化并不意味着道教的衰落,而是反映了道教发展的新形态与新方向。叶明生在《道教闾山派与闽越神仙信仰考》^㉒一文中,对闽越巫文化的信仰与闾山教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巫能昌在《制造科仪本:以闽西道坛灵应堂的度亡科本为例》^㉓一文中认为,灵应堂

度亡科本的修改、创作和实践显示,道教科仪本不仅是道教内部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还是道教实践与其他文化实践密切互动的产物。

赵卫东在《全真道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以济南长清马山隔马丰施侯庙为个案的研究》^①一文中,梳理了马山道教信仰的历史流变,认为全真道与民间信仰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董宇在《青岛地域民间道教神像探究》^②中认为,青岛地域的道教神像构成掺杂了各种信仰色彩,信仰活动总是与特定的人群联系在一起。

江浙地区的道教与民间信仰关系尤为密切,高万桑在《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③一文中,介绍了施道渊应对地方信仰尤其是“五通”崇拜的态度和措施,认为尽管“五通”信仰在苏州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边缘性,但是整体上已经被纳入主流道教体系之中。汪桂平的《江浙民间的〈庚申经〉与庚申会》^④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中国浙江省、江苏省部分地区遗存的《庚申经》及庚申会的现状,认为古老的守庚申习俗在中国内地并未消失,仍在活态地传承,而其传承地域主要集中于吴越文化区。

西南地区的道教发展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王家强、郭武的《川东北守清坛“开五方”度亡仪式研究》^⑤一文,认为“开五方”度亡仪式是传统道教度亡仪式的延续,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并融合了一些佛教和儒教的元素。申晓虎在《滇东北民间正一道安神开光科仪考察》^⑥一文中,细致梳理了此地区安神仪式中择吉、安神、开光三个步骤,并由此推断出该仪式的过程、表文、符、咒均展现了正统道教内容,同时又体现了浓厚的地方特性。

在岭南地区,黄大仙和金花夫人信仰流行,陈晨在《黄大仙信仰在岭南的初传及其本土化——以广州普济坛为例》^⑦一文中,以广州普济坛为例,梳理了黄大仙信仰在岭南早期的发展脉络,并解释了其本土化的进程和特点,展现了广州普济观结合时代的变迁以及岭南的地域文化及信仰习惯来确立自身信仰的特点。罗燚英的《明清时期五仙道观与金花信仰探析》^⑧讨论了金花夫人与五仙观之间的关系,认为明清时期金花夫人能够附祀五仙观既有信仰地理

因素的作用,也有道教女仙信仰传统的考量。

在西北地区,民间信仰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曾传辉在《青海省贵德县文昌神和二郎神信仰考察报告》^⑨一文中认为,民间信仰在贵德县多民族多宗教的和谐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李凤娇在硕士学位论文《清代以来东天山地区汉族民间信仰变迁研究》^⑩中,对东天山地区现存的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进行了调研,认为世俗化始终是清代以来东天山地区汉族民间信仰变迁的主导因素,汉族民间信仰自身的调整变化是其信仰变迁的动力,并推动其向民俗化的趋势发展,使其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

王晓莉在《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⑪中,对碧霞元君信仰的兴起及其从“淫祀”到官方供奉的转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对清代北京碧霞元君信仰的庙宇的数量和分布进行了考察,从而全面展示了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碧霞元君庙宇与香客活动之间的关系。孟昭锋在《明清时期泰山神灵变迁与进香地理研究》^⑫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泰山文化在全国的传播使得泰山信仰达到鼎盛时期,而香客从四面八方齐聚泰安以及开通朝山进香之路进一步推动了泰山信仰的传播。

明清时期,在皇室和道教的推动下,真武大帝信仰盛行,对社会各阶层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丁培仁在《玄帝信仰历史概要》^⑬一文中对“玄帝”名称的历史流变、玄帝信仰的历史变迁,以及明清时期玄帝信仰广泛传播的史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探讨。梅莉在《清代真武大帝信仰之流变》^⑭《明清时期武当山朝香习俗研究》等文章中认为,武当山朝顶进香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部分香客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香会组织活动增强与坚定了民间宗教信仰,增进了下层群体的团结与活力,对于调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梅莉在另一篇文章《明清以来湖北武汉木兰山真武信仰》^⑮中认为,木兰山无论道教宫观还是佛教寺庙,都有设殿供奉真武神像的现象,这反映了明清时期真武信仰的兴盛,以及真武信仰在被大力宣传的过程中逐渐为民众所认同并一直流传下来。明清时期,时局的动荡使得武当山道士纷纷前往各地传教,山西方山北武当正是这一时期开始传入道教的。白梅梅的《山

西方山北武当真武信仰研究》^⑨学位论文,从方山真武信仰圈形成的特殊地域环境、真武庙的修缮、朝山进香活动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北武当真武信仰的传承以及真武信仰在世俗化过程中与民众的生活关系。

2. 清代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研究

马西沙先生长期从事民间宗教与道教研究,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他认为明清时代,各种民间教派几乎没有一支不受到道教的启迪和助力,特别是受到内丹道炼养思想的影响。其在《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⑩一文中认为,道教最根本特点是把深奥的哲理与炼养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并指出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宝卷深受这种特点的影响,逐渐成为道教影响下层民众的中介物之一;该文还分析了道教与民间宗教在炼养思想上的异同。马先生的另一篇论文《一炷香教:世俗化道教教派》^⑪,从董四海与一炷香教的创立、传播,一炷香教的传播地区及组织特点,一炷香教的信仰风习与道教的关系,以及一炷香教与其他民间教派的融合四个方面,探讨了一炷香教的历史,并认为一炷香教的出现和流传展现了道教形态的多样化演变。

刘平、唐雁超的《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⑫,对明清时期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众多教派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认为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作者认为,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内容就是内丹修炼方法,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李志鸿在《三一教与道教雷法初探》^⑬一文中提出,三一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一种民间宗教,并且与道教中的雷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从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与三一教仪式、三一教对白玉蟾丹道理论的吸纳,以及三一教“金齿临,玉齿临”咒与道教雷法密咒三个方面,将三一教中的雷法与道教中相关的仪式进行细致的对比和分析,从而推断三一教作为民间宗教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程智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与佛教、道教界往来密切。李志鸿在《程智与道教及民间宗教初探》^⑭一文中,从程智与明末清初江南道教、程智与民

间宗教三一教两个方面细致梳理了程智与道教及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

六、清代道教与地方社会研究

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社会群体而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道教的宫观、仪式、思想观念、信教徒众等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着道教的演进与发展,同时,道教文化的存在和辐射,又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文化建构产生影响。

近年来,道教社会史研究逐渐形成一个热点领域,尤其是清代道教与社会的关系,学者们关注甚多,相关成果亦不少。相关研究大致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清代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二是清代道教与皇室、贵族、官员等上层社会的关系,三是清代道教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道教参与国家祭祀,历史悠久。明代初年敕建神乐观,以道士乐舞生负责国家祭祀自此肇始。清沿明制,亦设立神乐观。自明初创建至乾隆七年(1742)改革,神乐观的主要职员皆由道士充任。刘永华在《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⑮一文中指出,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进而渗透到礼部,他们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引导属于儒教系统的祭祀礼仪,并在其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从而展示了儒教与道教的互动历史。

清代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还表现在道士住持一些国家祭祀的庙宇并参与国家与地方祭祀事务。张广保在《道教与嵩山中岳庙的国家祭祀》^⑯一文中,探讨了道教在中岳庙的国家祭祀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由道教渗入中岳庙的国家祭祀仪典一事,可以看出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涉个体宗教信仰,而且也体现国家政治文化等礼制。林巧薇在《北京东岳庙与明清国家祭祀关系探研》^⑰中认为,明清时期北京东岳庙祭祀具有明显的“官祀”特征,其在国家祭祀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清代道教与宫廷、宗室的关系,以前相关研究较少,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突破。如杨海英《清前期的道教与宫廷》^⑱一文,利用档案、碑刻等材料,梳理

了后金以来到雍正年间清宫与道教的实际关系,认为道教在宫廷或民间都有巨大的市场,从而认为应该重新认识清前期宫廷与道教的关系。王卡在《雍正皇帝与紫阳真人——兼述龙门派宗师范青云》^①一文中考析了雍正皇帝与道教的关系,指出清世宗雍正皇帝笃好禅学,对道教方术亦有兴趣,他是清代对佛、道二教扶植最大的皇帝。雍正帝在位期间,特别优崇的道士有两位,一位是宋代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一位是当时的龙虎山法师娄近垣,并同年内加封两人为“真人”,而且拨帑银遣官为其修建道场,使得他们所代表的道教全真、正一两大教派因此一度兴盛。张莉在《清宫对北京东岳庙的有效管理》^②一文中。通过对大量的档案资料的整理研究,认为北京东岳庙与内廷关系密切,其举办的道场活动在清宫礼仪中占有重要地位。尹志华在《清朝宗室与道教》^③一文中指出,清朝皇室、宗室中有相当一批人与道教有各式各样的联系,如**诚**亲王允祜和贝勒奕绘正式皈依道教,分别受正一法箓和全真道戒;此外,有的认同道教斋醮科仪,有的与道士交往密切,但更多的则是把道教当作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等等。梅莉在《清代中晚期满族精英日常生活与道教——以顾太清、奕绘夫妇为中心》^④一文中,考察了清代著名词人、满族精英名流顾太清、奕绘夫妇的宗教文化生活,尤其是与道教的密切关系,认为道教逍遥无为、尊人贵生的学说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需要,道教对于生命个体的肯定和对人生快乐的追求也为他们提供了心理安慰。刘迅在《神仙与祖师:十九世纪中国满洲官员及其家人的道教世界》和《显真映圣:晚清时期的道教娘娘画、宫廷眷顾、命妇虔信与宫观扩张》^⑤等论文中,也探讨了清代政治文化精英阶层的道教信仰。

太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历史上常常与佛教、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清后期太监入道则形成一股风潮,学者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细致研析。尹志华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宝金山玉虚宫》^⑥一文中,通过对玉虚宫碑刻以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展现了清朝太监由于养老等捐助寺庙,并有很大一部分成为道门中人的现象。尹志华又在《清末太监与道教》^⑦一文中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致梳理,展示了同

治以降太监入道的风潮,证实了清代太监以寺庙为养老之地的传统,以及道教本身对太监的接纳和认可,显示了在政府默许的情况下,太监与道教之间的微妙关系。王佳音在《北京两处清代太监庙的历史与建筑》^⑧一文中,梳理了始建于明代并于清代先后成为太监庙的万寿兴隆寺和立马关帝庙的格局、建筑特征的历史变化,展现了清代太监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⑨亦探讨了清代的太监庙与道教的关系。

李润强在《清代科举与道教科仪》^⑩一文中,通过对道教中的与贡士、进士密切相关的文昌信仰进行梳理、考察,展示了明清时期在激烈的殿试竞争中,贡士寄希望于道教中的文昌信仰并举行相关的仪式,以及道教依靠这些相关的仪式来维持与贡士、进士之间的微妙关系。徐健勋《清代士人彭定求与道教因缘初探》^⑪则探讨了清代状元彭定求的道教信仰及与道士之因缘、交往。

总之,从皇帝、宫廷、太监到贵族精英等上层社会,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与道教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在历史上,道教与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也是近年来道教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倾向。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叶涛《泰山香社研究》^⑫、陈巴黎《从碑刻资料看北京东岳庙的香会组织》等论著,都对进香团体、香会组织、与道教信仰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揭示了道教庙宇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清代的很多宫观与周围社区都保持有密切的联系,为广大信众提供信仰服务和社会服务。付海晏的《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游观何为?民国初年城市游乐与大众文化中的白云观》等论著,探讨了北京白云观作为京城大众重要的宗教生活及游客场所的情况。刘迅的《护城保国——十九世纪中叶清廷抵御太平军时期的南阳玄妙观》^⑬一文,探讨了清代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南阳全真道玄妙观在守护南阳城池的几次战斗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了南阳玄妙观在历史和塑造地方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赵庆华在《清代台湾妈祖庙社会功能的区域性表现》^⑭一文中认为,妈祖庙在清代台湾发挥了多元社会功

能——参与公益事业、移民精神安慰、同乡联系纽带、教育教化民众、军事战略防御及处理族群纠纷等。宋建明的《博山云行山道教与地方社会》^⑧一文，则梳理了住持云行山诸庙宇的全真道士与地方士绅、富姓大族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认为云行山诸庙宇的全真道士借此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和象征资本。郭峰在《近代城市宫观与地方社会》^⑨论文中，从地方政府、乡绅、传戒活动、附属宫观、斋醮、慈善、进香活动等多个方面详细具体地论述了玉皇山福星观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闫珂在《近代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研究》^⑩论文中，探讨了清代的崂山道教积极与地方信仰和世俗生活的靠近、结合，并成功获得地方认同感，从而走上了世俗化、民间化的持续发展道路。

七、回顾、展望与思考

综上所述，清代道教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热点领域，学者们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学术论著，对于清代道教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近些年来更有重要推进和突破。尤其在清代名山宫观、著名道士、传戒问题、宗派传承与谱系、道教与民间信仰、道教与社会等专题领域，学者们关注甚多，取得很多重要成果或突破性进展。

然而，清代历时近300年，地域广大，清代道教在各时段、各地区的表现形态及其社会影响，以及清代道教本身的发展脉络、道派传承等诸多问题，并未完全梳理清楚，有待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和进一步的细致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创新运用。大致说来，清代道教历史尚需从以下方面进行大力挖掘和研究。

第一，清代道教文献的继续挖掘整理。清代道教文献浩如烟海，既有清代道士的著述、民间科仪文本、劝善书等，也有正史、实录、档案、文集、地方志（宫观志）等的相关记载，还有海量的碑刻铭文。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如《藏外道书》《三洞拾遗》《中国道观志丛刊正续编》^⑪等大型道教文献汇编的出版，汇编的多是明《道藏》未收的道教典籍，且大部分是清代产生的道书。又如何建明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⑫，将6700余种地方志中的佛道教资料汇编成册，大大有利于清代

道教的研究。又如王见川、高万桑合编的《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⑬，汇集了不少天师制度史的资料。同时，道教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也是近几十年来的热点，并且出版了相当可观的整理成果，如赵卫东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已出版5本，樊光春主持的“陕西、山西道教碑刻调查”丛书亦已出版8本，还有萧霓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潘明泉《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刘永、杨立志《武当山金石碑刻选录》等^⑭均已出版，这些整理出来的道教碑刻资料中，以清代碑刻为主体，因而有力地推动了清代道教的研究。

文献整理仍然是此后清代道教研究的一个方向和重点，而且偏向于一些大型集体项目。如“中华续道藏”工程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全国10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主要搜集、整理清代以来的新出道书。《东方道藏：民间道书合集》^⑮也已出版第一辑20册，其搜集的文献也以清代以来的手抄本为主。另外，一些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如“清代档案道教文献研究”“清代诗文集集中的道教资料汇纂与研究”“陕西道教碑刻整理与研究”“武当山道教碑刻收集、整理与研究”“甘肃道教碑刻的调查与整理研究”等项目，也在陆续启动和研撰之中，相信随着这些成果的完成和出版，定会有力地推动清代道教文献和道教史的研究。

第二，清代道教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既有研究偏重于清代道教本身的发展史，对于清代道教管理制度以及道教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等，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力度仍显不够，因此对于清代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清代道教政策、清代道教组织与仪式的变迁等专题研究，是未来需要加大努力的方向。

第三，清代道教宗派研究尚需着力。既有研究已经对清代道教的众多流派如正一派、净明派、清微派、全真龙门派、华山派、金山派、霍山派、碧洞派等有所关注和研究，但实际上清代道教支派林立，多达100余种。因此，全面梳理清代道教各主要流派的发展历史，分析清代众多道派产生、存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也是未来需要着力的研究领域。

第四，清代道教的文化定位问题需要重点思考。对于以前的主流看法即主张道教在清代走向衰

落的观点,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王卡、杨海英、尹志华等,但相关的资料挖掘和研究深度均不够,因此着眼于社会史的视角,发掘清代道教在中国社会建构、精神文化建构中的实际作用,揭示清代道教在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中所体现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未来的一个研究重点。

第五,既有的研究著作中,目前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清代道教史”专著出版,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写的两部道教通史类著作中,都有部分章节涉及清代道教,但总体来说篇幅不够。例如,在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①第十七章“明清道教两大派”中,有几节梳理了清代道教,包括“清代正一道的衰落”“清代全真道的中兴”“明清内丹诸家的思想”“明清道教在民间”,基本勾勒出了清代道教发展的基本状况。而卿希泰主编的4卷本《中国道教史》第四卷^②中,有两大章涉及清代道教,包括第十一章“道教在明后期至嘉道间的衰微”、第十二章“道教在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时期的进一步衰落及其在民间的日趋活跃”,并重点考述了正一道、全真道等道派在明清之际的传承发展和盛衰变化。但总体来说,这两部道教通史都没有将清代道教作为独立的一章进行撰写,从篇幅到内容都显不足;而且两部道教史均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对于近年来清代道教研究的新资料、新成果,显然不能涵盖。可喜的是,卿希泰、詹石窗主编的5卷本《中国道教通史》于2019年出版,在原4卷本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增补,其中第4卷涉及清代道教的章节虽只有第十一章“道教在明后期至嘉道间的衰微”和第十二章“道教在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的流迁”^③,但在内容上大为扩充,并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的新成果、新观点,使得清代道教的历史脉络更为清晰、完善,但这部通史仍然没有把清代道教作为独立的一章来写。因此,对于清代道教进行全方位、全地域、全时段的系统梳理,形成一部《清代道教史》专著,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时代使命。

注释:

①虽然目前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清代道教史”类专著出

版,但有不少著述涉及清代道教,例如,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等通史类著作,有部分章节涉及清代道教。又如萧霁虹、董允《云南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孔令宏等《浙江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赵芑《山东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刘庆文等《河北道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刘固盛等《湖北道教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等区域道教史著作,以及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巴蜀书社,2000)、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汪桂平《东北全真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等教派史研究,都涉及某一地区或某一派别的清代道教,有的甚至以清代道教史研究为主体内容。

②允陶等奉敕监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9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③[法]高万桑:《1736-1739年中国宗教人口大普查》,付海晏主编《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④王见川:《近代(1840-1949)变局下的张天师——兼谈其对华南道教之影响》,黎志添主编《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5。

⑤[法]高万桑:《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曹新宇、古胜红译,《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⑥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⑦刘永、杨立志:《武当山金石碑刻选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

⑧梅莉:《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以武当山现存碑刻为考察中心》,《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香习俗研究》,《暨南史学》2004年第3期;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的地理分布》,《江汉论坛》2004年第12期;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的祈求愿望》,《鄱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梅莉:《明清政府对武当山进香的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梅莉:《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中兴初探》,《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梅莉:《清代武当山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与武当山宫观的复修》,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02~316页。

⑨杨立志:《三山滴血派与武当清微派》,《鄱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5期。

⑩陈金凤:《宋元明清时期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发展述论》,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⑪[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4。

⑫[日]吉冈义丰:《白云观的道教》,北京新民印书馆,1945。

⑬该文刊载于《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4期、第2卷第1期、第3卷第1~3期,1935年12月~1936年10月。

⑭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⑮李信军主编《水陆神全:北京白云观藏历代道教水陆画》,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⑯付海晏:《北京白云观与近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⑰付海晏:《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⑱付海晏:《游观何为?民国初年城市游乐与大众文化中的北京白云观》,《全真道研究》2017年第1期。

⑲林巧薇:《清乾嘉时期北京白云观事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

⑳尹志华:《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云观传戒考述》,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㉑尹志华:《北京白云观藏历代律师方丈监院画像的史料价值》,《中国道教》2014年第1期。

㉒尹志华:《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初探》,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326~340页。

㉓尹志华:《清代北京白云观住持(方丈)、监院传承考》,黎志添主编《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地方道教变迁》,香港三联书店,2013,第283~316页。

㉔刘厚滋:《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

㉕叶郭立诚:《北平东岳庙调查》,《民俗丛书》第46册,东方文化书局,1939。

㉖陈巴黎编著《北京东岳庙》,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

㉗赵世瑜:《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

㉘袁志鸿主编《北京东岳庙志》上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㉙关昕:《北京东岳庙研究综述》,《泰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㉚傅长青:《回忆东岳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北京

出版社,1984。

㉛林巧薇:《北京东岳庙与明清国家祭祀关系探研》,《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

㉜关昕:《从明清北京东岳庙祀典看“小祀”制度的融通性》,《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4期。

㉝Anne Swann Goodrich:《民俗宗教与皇家祭祀:北京东岳庙供奉诸神之考察》,李锦萍译,《北京民俗论丛》2015年第3期。

㉞高寿仙:《国家祀典、儒家理念与民俗信仰的冲突与交融——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的考察》,《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1期。

㉟汪桂平:《北京东岳庙下院天仙宫小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㊱林巧薇:《元朝至民国时期北京东岳庙的道派传承与住持传继》,《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4期。

㊲常人春、陶金:《北京东岳庙道场疏文稿集初探——管窥清代北京东岳庙道场及道士的多重社会身份》,刘仲宇、吉宏忠主编《正一道教研究》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㊳张莉:《清宫对北京东岳庙的有效管理》,[法]吕敏、陆康主编《香火新缘——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中信出版集团,2018,第222~250页。

㊴陈巴黎:《从碑刻资料看北京东岳庙的香会组织》,《北京档案》2012年第2期;陈进国:《〈燕行录〉咏北京东岳庙诗抄》,《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王婧泽:《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笔下的北京东岳庙及其文化心理》,《中国道教》2019年第6期;梁茵:《传承与变迁:北京东岳庙信仰活动的日常与节日》,《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2019年第1期;萧放:《东岳庙与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北京东岳庙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㊵[日]五十岚贤隆:《道教丛林太清宫志》,国书刊行会,昭和13年(1938)初版,昭和61年(1986)原版再刊。

㊶孙嗣志、蒋镇浩:《太清宫开山祖师郭守真》,《中国道教》1990年第3期。

㊷郁其文:《太清宫纪实》,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85。

㊸汪桂平:《沈阳太清宫历代传戒考略》,熊铁基、黄健荣主编《第三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338~361页。

㊹杨新成:《明清大高玄殿建筑史料表》,《紫禁城》2013年第1期。

㊺杨新成:《大高玄殿建筑群变迁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

㊻李友唐:《北京大高玄殿》,《北京档案》2013年第1期。

④7 王方捷、何蓓洁：《清乾隆朝大高玄殿建筑群演变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

④8 杨靖筠、刘淑一：《北京城中轴线上的皇家道观——大高玄殿》，张妙弟主编《北京学研究2011：北京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同心出版社，2011，第127～133页。

④9 高换婷：《明清之际的大高玄殿》，《北京档案》2014年第2期。

⑤0 王建涛：《大高玄殿的沧桑岁月(上)》，《紫禁城》2012年第5期。

⑤1 王建涛：《大高玄殿的沧桑岁月(下)》，《紫禁城》2012年第8期。

⑤2 刘文丰：《皇城道观大高玄殿》，《北京观察》2010年第8期。

⑤3 陶金：《大高玄殿的道士与道场——管窥明清北京宫廷的道教活动》，《故宫学刊》2014年第2期。

⑤4 李合春、丁常春编著《青羊宫二仙庵志》，四川新闻出版局/川新出内(2006)102号。

⑤5 王士伟：《楼观道源流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⑤6 张建新、陈月琴编著《西安八仙宫》，三秦出版社，1993。

⑤7 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⑤8 王西平、陈法永主编《重阳宫与全真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9 黎志添：《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⑥0 陈莲笙：《海上白云观》，《中国道教》1989年第4期。

⑥1 王丽：《论清初盛京“皇家道院”三官庙》，《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八辑(下)，中国紫禁城学会，2012，第20～27页。

⑥2 冯岁平、余星银：《清代陕西勉县武侯祠研究》，《文博》2003年第1期。

⑥3 樊光春：《陕西留坝张良庙十方丛林志》，《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

⑥4 梅莉、张朗：《晚清武汉长春观的崛起》，《全真道研究》第三辑，齐鲁书社，2014。

⑥5 赵建永：《中国北方妈祖文化中心——天津天后宫》，《中国道教》2018年第6期。

⑥6 张广保：《道教与嵩山中岳庙的国家祭祀》，《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⑥7 王纯五：《青城山道教的宗派和现状》，《宗教学研究》1987年第3期。

⑥8 王晓乔：《清代道士与成都武侯祠》，《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8期。

⑥9 尹志华：《清代委羽山道教略述》，《中国本土宗教研究》

2018年第1期；尹志华：《清末民国时期的宝金山玉虚宫》，《中国道教》2015年第2期。

⑦0 贾晓龙：《明清时期兴隆山道教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1。

⑦1 Vincent Goossaert, "The Quanzhen Clergy, 1700–1950,"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1(2004): 699–772[法]高万桑：《1700–1950年的全真教》，张广保主编《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齐鲁书社，2013)。

⑦2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⑦3 吴真：《华北地方社会中的全真道士：以华山法派赓续与公共庙宇经营为中心》，黎志添主编《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地方道教变迁》，第341～382页。

⑦4 唐大潮：《王常月修道思想略论》，《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张钦：《论王常月的修炼思想》，《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张应超：《王常月与全真道的中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期；邝国强、李永明：《王常月〈龙门心法〉中“清静”与“心”两大概念之考察》，熊德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03～114页；乐爱国：《王常月的伦理思想》，熊德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262～272页；李安：《王常月道教改革思想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尹志华：《王常月的修道思想略述》，《中国道教》2010年第2期；张巍青：《王常月戒律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0。

⑦5 尹志华：《王常月学案》，齐鲁书社，2011。

⑦6 熊建伟：《施道渊传略》，《中国道教》1994年第3期；周治：《施道渊穹窿山法派考述》，《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4期；王见川：《彭定求的扶鸾与著书：从其与清初著名道士施道渊的关系谈起》，《道教学刊》2018年第2期。

⑦7 [日]细谷良夫：《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娄近垣为中心》，张泽洪译，《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

⑦8 曾召南：《娄近垣及其与正一支派的关系》，《中国道教》1995年第1期。

⑦9 孔祥麟：《妙正真人娄近垣的生平著作及思想》，《中国道教》2006年第3期。

⑧0 陈星宇：《论清初道士娄近垣的白话诗——兼及与雍正禅学的关系》，《学术交流》2014年第6期。

⑧1 罗文华：《清代高道娄近垣事迹考述》，沈卫荣、谢继胜主编《贤者新宴——王尧先生八秩华诞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

⑧2 刘仲宇：《刘一明学案》，齐鲁书社，2009；刘宁：《刘一明

修道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丁述学编著《刘一明与兴隆山》，华夏出版社，2018。

⑧李远国：《刘一明“九要八法”概述》，《中国道教》1993年第2期；詹石窗：《刘一明诗歌的道教内涵及其审美旨趣》，《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吴受琚：《刘一明道行考》，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白嫫棠：《刘一明金丹论对阳明良知论的融摄》，《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陈伟华：《刘一明的阴阳思想探析》，《铜仁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何建明：《刘一明道教养生哲学方法论和境界说》，《中国道教》1992年第2期；杨光文：《刘一明的修心养性思想及其现代思考——以〈神室八法〉为例》，《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徐恩栓：《略说刘一明〈易理阐真〉的丹易合一思想》，《中国道教》2007年第2期；贾来生：《刘一明丹道养生思想的贡献和现代价值》，《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贾来生：《刘一明丹道养生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刘仲宇：《通关与身体健康读刘一明〈通关文〉有感》，《中国道教》2013年第3期；谭清华：《刘一明〈道书十二种〉农学思想考述》，《社科纵横》2017年第2期；王闯：《论刘一明〈道德经义〉的诠释特点》，《全真道研究》第四辑，齐鲁书社，2015。

⑨王永平：《清代刘一明的道学思想》，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赵相彬：《刘一明内丹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贾海辉：《刘一明老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计拓：《刘一明三教合一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王景霖：《刘一明的易学本体论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2013；宋宇：《清代刘一明丹道思想特色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6；王楠：《刘一明易学生命哲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7；李艺芊：《刘一明三教合一思想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19；辛敏：《刘一明内丹学新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0。

⑩吴亚魁：《金盖山人闵一得传略》，《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3期；陈云：《闵一得生年及名号考》，《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陈云：《闵一得著作考释》，《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赖全：《闵一得生年新考》，《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

⑪李远国：《论闵一得丹法的几点特征》，尹信慧主编《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盖建民：《闵一得与道教“医世”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唐大潮：《试析闵一得“真一”、“真元”论及其三教观》，《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刘焕玲：《试析闵一得之龙门方便法门》，《中国道教》2005年第5期；吴大振：《闵一得内丹养生思想探微》，《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李汉超、陈志丹：《闵一得修身治世之哲学阐释》，《甘

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张晟：《闵一得“炼神还虚”论发微》，《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陈云：《闵一得的女丹思想》，《中国道教》2016年第2期；陈云：《闵一得三教思想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8期。

⑫陈云：《清代道士闵一得研究中的问题点及其进展》，《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⑬赖全：《统合与革新：闵一得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⑭陈云：《闵一得研究》，巴蜀书社，2017。

⑮曾召南：《道士傅金铨思想述略》，《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1996；朱越利：《清代道士傅金铨小考》，《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3期；于兴汉：《试论傅金铨的道家教育思想》，《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2009。

⑯谢正强：《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5。

⑰陈泽泓：《著〈寰天图说〉建朝斗高台——清代自学成才的天文学家、道士李明彻》，《广东史志》1994年第4期；龙加林：《一代大师——李青来》，《中国道教》1994年第2期；甄鹏：《清朝道士李明彻及其科学成就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甄鹏：《李明彻考评》，《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王丽英：《真有道之士——晚清道士李明彻散论》，《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王丽英、黄银鸽：《岭南全真高道李明彻与广州纯阳观》，熊铁基、黄健荣主编《第三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17。

⑱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⑲沙武田：《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2004

⑳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中国道教》2008年第5期。

㉑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箓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

㉒方广钊：《王道士名称考》，《敦煌研究》2016年第4期。

㉓方莉：《“福琳”似非王道士本名》，《敦煌研究》2018年第5期。

㉔樊光春：《功过难评王圆箓——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背景剖析》，《西部大开发》2011年第4期；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中国道教》2008年第5期。

㉕李传玺：《活着的王圆箓》，《文史天地》2004年第5期。

㉖张振国：《是是非非王圆箓》，《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4期。

㉗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㉘高德祥：《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箓》，《西部》(新文学)2001年第4期。

㉙余秋雨：《道士塔》，《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

⑩孙嗣志、蒋镇浩：《太清宫开山祖师郭守真》，《中国道教》1990年第3期。

⑪孙诚：《郭守真与东北道教的传播》，《兰台世界》2001年第12期。

⑫丁常云：《海上白云观开山祖师徐至成》，《中国道教》1993年第1期。

⑬南岳道教协会：《南岳清代高道李皓白》，《中国道教》2000年第5期。

⑭陈月琴：《董清奇与〈除欲究本〉》，《中国道教》1998年第4期。

⑮王安明：《二王庙道教事业的开拓者——王来通》，《中国道教》2006年第2期。

⑯张方：《明末全真道士郭静中生平考略》，《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⑰黄新华：《清初苏州道士李朴其人其事》，《中国道教》2016年第1期。

⑱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日本机密档案中的白云观与高道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⑲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初探》，《全真道研究》第一辑，2011。

⑳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若干史实再考察》，《道教学刊》2018年第2期。

㉑尹志华：《嘉庆至清末京外全真丛林传戒考》，《中国道教》2017年第5期。

㉒郭峰：《晚清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传戒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

㉓郭峰、梅莉：《晚清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传戒历史初探》，《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

㉔王辉刚：《晚清民国成都二仙庵传戒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

㉕汪桂平：《沈阳太清宫历代传戒考略》，熊铁基、黄健荣主编《第三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㉖尹志华：《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云观传戒考述》，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㉗汪桂平：《清代全真道授戒的珍贵文存》，《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1期。

㉘尹志华：《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初探》，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326～340页。

㉙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史料补述》，《中国道教》2015年第5期。

㉚李远国：《南宗道教历史与传戒授篆的考辨》，《老子学刊》2016年第2期。

㉛马海燕：《明清佛教与全真道传戒研究发微》，《法音》2016年第4期。

㉜王卡：《诸真宗派源流校读记》，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49～75页。

㉝赵卫东：《全真道宗派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盖建民主编《“回顾与展望：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文集》，巴蜀书社，2016，第98～131页。

㉞张广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全真道研究》第一辑，齐鲁书社，2011。

㉟郭武：《有关全真道宗派“字谱”研究综述》，熊铁基、梁发主编《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248～254页。

㊱赵卫东：《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80～306页。

㊲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

㊳赵卫东：《青州全修真宫考》，《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

㊴赵卫东：《河南济源全真道宗派传承考》，(香港)《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2013年第5期。

㊵赵卫东：《李常明一系龙门派传承考》，《全真道研究》第三辑，齐鲁书社，2014。

㊶樊光春：《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第261～279页。

㊷何建明：《东北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源流——以旅顺口长春庵、老爷庙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㊸吴亚魁：《江南全真道门所见之诸真宗派与传承谱系》，《全真道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2011。

㊹尹志华：《晚清全真道新探》，《全真道研究》第三辑，齐鲁书社，2014。

㊺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

㊻李大华：《论华南全真道教的宗派关系》，《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

㊼秦国师：《明清以来(1368-1949)泰山道派考略》，《中国道教》2011年第3期。

㊽张方：《碑刻所见介休后土庙龙门派传承》，《全真道研究》第三辑，齐鲁书社，2014。

㊾王卡：《清代天师道概述》，刘仲宇、吉宏忠主编《正一道

教研究》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⑬郭武:《明清时期全真道与净明道关系略论——以逍遥山万寿宫为中心》,赵卫东主编《问道崑崙山——齐鲁文化与崑崙山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9,第262~275页;郭武:《明清净明道与全真道关系略论——以人物交往及师承关系为中心》,《全真道研究》第一辑,2011;郭武:《朱道朗与青云派》,《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⑭曲爽、张炜:《清微派传承考——以赵宜真、李得晟传天津天后宫一系为主》,刘仲宇、吉宏忠主编《正一道教研究》第五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⑮陈文龙:《闾皂山宫观史及其灵宝派传承世系考》,《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⑯刘雄峰:《明清以来山西正一道教的演变和融合——对数个碑刻资料的解读和田野调查所证》,刘仲宇、吉宏忠主编《正一道教研究》第六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⑰张超然:《专醮酬恩:近代道教为民间信仰所提供的仪式服务》,《新史学》2019年第1期。

⑱魏德毓:《明以来正统道教世俗化与民间仪式传统建构》,《福建史志》2020年第1期。

⑲魏德毓:《明以来正一派道教的世俗化——对闽西火居道士的调查》,《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⑳叶明生:《道教闾山派与闽越神仙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㉑巫能昌:《制造科仪本:以闽西道坛灵应堂的度亡科本为例》,《道教学刊》2018年第2期。

㉒赵卫东:《全真道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以济南长清马山隔马丰施侯庙为个案的研究》,《全真道研究》第一辑,2011。

㉓董宇:《青岛地域民间道教神像探究》,《艺术教育》2015年第5期。

㉔[法]高万桑:《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

㉕汪桂平:《江浙民间的〈庚申经〉与庚申会》,《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㉖王家强、郭武:《川东北守清坛“开五方”度亡仪式研究》,《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1期。

㉗申晓虎:《滇东北民间正一道安神开光科仪考察》,《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㉘陈晨:《黄大仙信仰在岭南的初传及其本土化——以广州普济坛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

㉙罗焱英:《明清时期五仙道观与金花信仰揆析》,《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㉚曾传辉:《青海省贵德县文昌神和二郎神信仰考察报

告》,《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

㉛李凤娇:《清代以来东天山地区汉族民间信仰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15。

㉜王晓莉:《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㉝孟昭锋:《明清时期泰山神灵变迁与进香地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

㉞丁培仁:《玄帝信仰历史概要》,《中国道教》2016年第5期。

㉟梅莉:《清代真武大帝信仰之流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㊱梅莉:《明清以来湖北武汉木兰山真武信仰》,《全真道研究》第二辑,2011。

㊲白梅梅:《山西方山北武当真武信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6。

㊳马西沙:《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㊴马西沙:《一炷香教:世俗化道教教派》,《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

㊵刘平、唐雁超:《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

㊶李志鸿:《三一教与道教雷法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

㊷李志鸿:《程智与道教及民间宗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6期。

㊸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

㊹张广保:《道教与嵩山中岳庙的国家祭祀》,《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㊺林巧薇:《北京东岳庙与明清国家祭祀关系探研》,《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

㊻杨海英:《清前期的道教与宫廷》,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三联书店,2008,第365~410页。

㊼王卡:《雍正皇帝与紫阳真人——兼述龙门派宗师范青云(上)》,《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1期;王卡:《雍正皇帝与紫阳真人——兼述龙门派宗师范青云(下)》,《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

㊽张莉:《清宫对北京东岳庙的有效管理》,载[法]吕敏、陆康主编《香火新缘——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第222~250页。

㊾尹志华:《清朝宗室与道教》,《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

㊿梅莉:《清代中晚期满族精英日常生活与道教——以顾

太清、奕绘夫妇为中心》，《江汉论坛》2016年第6期。

⑬刘迅：《神仙与祖师：十九世纪中国满洲官员及其家人的道教世界》，张广保主编《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齐鲁书社，2013。刘迅：《显真映圣：晚清时期的道教娘娘画、宫廷眷顾、命妇虔信与宫观扩张》，张广保主编《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齐鲁书社，2013。

⑭尹志华：《清末民国时期的宝金山玉虚宫》，《中国道教》2015年第2期。

⑮尹志华：《清末太监与道教》，《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⑯王佳音：《北京两处清代太庙的历史与建筑》，《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第5期。

⑰张雪松：《清代以来的太庙庙探析》，《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⑱李润强：《清代科举与道教科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⑲徐健勋：《清代士人彭定求与道教因缘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⑳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㉑刘迅：《护城保国——十九世纪中叶清廷抵御太平军时期的南阳玄妙观》，《全真道研究》第一辑，2011。

㉒赵庆华：《清代台湾妈祖庙社会功能的区域性表现》，《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

㉓宋建明：《博山云行山道教与地方社会》，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

㉔郭峰：《近代城市宫观与地方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

㉕闫珂：《近代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7。

㉖胡道静、陈耀庭等主编《藏外道书》全36册，巴蜀书社，1992-1994；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全20册，黄山书社，2005；张智、高小健主编《中国道观志丛刊正续编》全64册，广陵书社，2015。

㉗何建明主编《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全103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㉘王见川、高万桑：《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

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道教碑刻资料的整理一直热度不减，出版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大致有如下30余种。张华鹏、张富清：《武当山金石录》，丹江口市文化局，1990；王忠信：《楼

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吴钢、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龙显昭、黄海德：《巴蜀道教碑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杨世华：《茅山道院历代碑铭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赵世瑜：《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碑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吴亚魁：《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王富春、张飞荣：《中国佳县白云山白云观碑刻》，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佟洵：《北京道教石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赵卫东等：《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齐鲁书社，2010；赵卫东等：《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赵卫东等：《山东道教碑刻集·博山卷》上下册，齐鲁书社，2013；曹永斌：《药王山碑刻》，三秦出版社，2013；黎志添、李静：《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中华书局，2013；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潘明权、柴志光：《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崆峒区文史资料（第十辑）·崆峒金石》，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陈文龙：《山西道教碑刻·阳泉卷（第一册）·平定县》，香港：青松出版社，2016；陈文龙：《山西道教碑刻·阳泉卷（第二册）·城区、郊区》，香港：青松出版社，2016；张方：《山西道教碑刻·太原晋中卷》，香港：青松出版社，2016；刘康乐：《山西道教碑刻·长治卷（第一册）·沁源县、沁县、武乡县》，香港：青松出版社，2018；刘永、杨立志：《武当山金石碑刻选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赵卫东、陈法永：《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赵卫东等：《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齐鲁书社，2020；赵建勇：《山西道教碑刻·运城卷（第一册）·垣曲县、新绛县》，香港：青松出版社，2020；赵建勇：《山西道教碑刻·运城卷（第二册）·绛县》，香港：青松出版社，2020；赵建勇：《山西道教碑刻·运城卷（第三册）·夏县》，香港：青松出版社，2020；赵建勇：《山西道教碑刻·运城卷（第四册）·盐湖区、芮城县》，香港：青松出版社，2020。

㉚孔令宏主编《东方道藏：民间道书合集》（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㉛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㉜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㉝卿希泰、詹石窗：《中国道教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9。